

# 與張愛玲齊名的四〇年代女作家

## 梅 娘

### 另眼看作家之十一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2005年8月《梅娘近作及書簡》出版了，這位成名於20世紀三〇年代末、四〇年代初淪陷區的文壇才女，當年曾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在文壇上沉寂了半個多世紀後，以86歲的高齡，再度推出她的作品，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梅娘近作及書簡》書中彙集了梅娘的散文近作60篇，書信88封，有關於趙樹理、蕭紅、張愛玲、關露、遇羅克、劉索拉的描寫，以及致丁景唐、丁東、成幼殊、釜屋修、岸陽子等中外名家信札，文字爐火純青。而這位文壇奇女子「生活流程中的許多故事，也都在這本書中。」

梅娘，原名孫嘉瑞，祖籍山東招遠縣。於1920年12月22日出生在海參崴，在吉林省長春市長大。她的父親孫志遠在孩童時代就和他的家人移居到了長春，他從給英國洋行當小伙計，做到東北頗有名氣的實業家。出身豪門的梅娘剛兩歲，身為偏房的母親被正房驅逐，從此生死不明。飽受了失去親娘之痛的她，長大後取了筆名「梅娘」，就是取諧音「沒娘」的意思。儘管如此，梅娘和父親的關係很好，她父親鼓勵她自立（像男人一樣），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梅娘就敢騎馬穿越街道，震驚四鄰。當她4歲的時候，在家裏同時接受了中西教育，她跟一個前清的拔貢秀才讀經寫字，跟一個俄國老太太學習英語。1930年，當她10歲的時候，在吉林省立女中初中部正式就讀，她受到「五四」新文學的啟蒙，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九一八」事變，梅娘中斷了學校生活。正是這個時期，她進行了廣泛的閱讀。除了看家裡的藏書外，還買了全套林琴南的翻譯小說，以模仿他優美簡鍊的文字，並試著翻譯初級英語讀物。1934年，她重新回到學校上學，她暗地裏閱讀蕭軍和蕭紅的作品，暗地裏閱讀能夠找到的中國書籍。她還把自己的愛和恨訴諸於文字，語文老師孫曉野將這些習作輯集成冊，取名《小姐集》，交付益智書店。1936年她出版了這第一部作品，很遺憾，在以後的歲月裏，這部作品卻永遠地遺失了。

1936年，梅娘中學畢業，父親去世，他的生前好友張鴻鵠，時任哈爾濱電業局局長，他說服了孫家，送梅娘赴日留學。梅娘進入東京女子大學家政系學習，這一時期她開始閱讀郭沫若、列寧和馬克思的著作，進一步拓寬了視野。正當梅娘墜入書海，勤奮閱讀魯迅、朱光潛、鄒韜奮、蕭紅、蕭軍等人的作品時，蘆溝橋的炮聲使她坐不安席，彷徨無措。此時，梅娘認識

了柳龍光，一個在日本內山書店打工，靠自己掙錢在早稻田大學攻讀經濟學的中國留學生，二人開始了為孫家所不容的自由戀愛。孫家斷絕了對梅娘的經濟援助，但這並沒有動搖梅娘追求愛情和自由的信念，她選擇隨著柳龍光流浪。「我們如饑似渴地尋覓著救國之路，究竟一個什麼樣的政權才能打敗侵略者？我們互相辯論，互相啓示，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梅娘和柳龍光身邊，聚集了一批中日反戰作家。與此同時，梅娘筆下流淌出的文字，也浸透了身世之悲和家國之痛。

由於家庭斷絕了她的經濟支援，因此梅娘被迫返回「滿洲國」。1938年，她在「滿洲國」日本人控制的《大同報》做校對，並主編一週一次的婦女版。同年，柳龍光追尋梅娘到了長春，梅娘拒絕了家庭給她安排的婚事，這對年輕人，不顧家庭的反對，開始了同居生活。他們的住所成了「滿洲國」首都年輕人的文藝沙龍，也成了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在日本反戰學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岸田國士的支持下，成立了《文叢》雜誌，梅娘也加入了這個組織，他們倡導用筆來描寫真實、暴露真實。遺憾的是，由於缺乏資金支持，他們自創的雜誌很快就停刊了。之前，《文叢》刊出了梅娘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這部當時受到高度讚揚的作品收錄了11篇短篇小說，被認為是「滿洲國」文學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義的作品。在《第二代》的前言中，「滿洲國」著名作家梁山丁作出了權威性的評價：「從《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給了我們一個嶄新的前進的意識，《小姐集》描寫著小女兒的愛與憎，《第二代》則橫透著大眾的時代的氣息。」

1939年底，柳龍光受雇於華文《大阪每日》，他們移居到了日本。華文《大阪每日》給梅娘和柳龍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觸日本社會的機會，梅娘目睹了戰爭同樣給日本老百姓帶來的困苦。在這樣的背景下，梅娘寫了《蚌》、《魚》和《蟹》等小說。

「珍珠港事件」後，柳龍光夫婦回到了中國。柳龍光被聘請到北京，掌管原來由日本情報部門控制的雜誌社，他改組了原有的作家協會任幹事長。梅娘則受聘北平《婦女》雜誌任編輯和記者。當時梅娘只知道丈夫應日本友人龜谷利一的約請主持一份雜誌，卻不知道他還肩負著中共北平地下黨員的秘密使命。龜谷本想通過辦雜誌掃卻戰爭陰霾、化解中日仇恨，結果被扣上宣傳「大東亞共榮共存」不力的諸多罪名，遣送回國。梅娘始終認為婦女的受壓制和男性中心社會的相糾葛，是整個社會問題的根源。她在給另一作家吳瑛的信中就說：「我想女人是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這世界變成天堂……女人在這個社會中受到許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難和痛苦……」。這些話語，控訴了「滿洲國」男性中心社會的所謂「樂土」。

1943年，柳龍光掌管的幾份雜誌賣得不錯，他倆繼續秘密參與中共地下黨的工作。他們共同參加了滿洲華北的文化聯絡活動，在北京相對自由的文學界中，梅娘積極介紹「滿洲國」的女性作家，如吳瑛、藍苓、朱媿等。梅娘的《蚌》、《魚》、《蟹》這三部小說，奠定了梅娘的成功。同年，《魚》獲得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賞」的「賞外佳作」獎。次年，《蟹》獲得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正賞。這三部小說都形象地描繪了年輕中國女性為壓迫作出的抗爭。殖民社會成為她們的恐懼，沒有安全感的壓抑背景，作為一個整體，《蚌》、

《魚》、《蟹》描寫了日本佔領下男性中心社會中，中國女性抗爭不屈的真實。她公開批評殖民生活，而她對婦女問題的關注有效地掩蓋了統治者對她作品政治內涵的察覺。她沒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評價。因為婦女問題，並不僅僅限於殖民地社會，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丁玲就寫下了〈三八節有感〉。

梅娘編輯《婦女》雜誌，寫了幾部小說，這一連串成就都在她25歲之前完成。不幸的是，這卻為她以後的30年悲劇做了伏筆。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東北故鄉；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臺灣；1949年中共建國前夕，梅娘夫婦決定回大陸，參加建設滿目瘡痍的祖國，可嘆的是，柳龍光在歸途中，所乘的太平輪在舟山附近與另一船相撞沈沒。柳龍光死時年僅33歲。梅娘在失母喪父之後，迎來更慘痛的第三次打擊。梅娘懷著身孕忍著傷痛把他們的兩個女兒帶回了祖國。返回大陸後，梅娘曾當過兩年的中學語文教員。1951年，她被調到農業部宣傳司，是最早參與農業電影製片廠的。

20世紀五〇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經生活在淪陷區的作家一樣，被定位為「漢奸文人」，他們經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1955年的肅清反革命運動，1957年則被劃為「右派」及間諜嫌疑。她一直被審查，挨批判、勞教、管制，劃入另冊，過著非人的日子。對於梅娘來說：那個時代是在監禁和強迫勞動中度過的。在漫長的艱苦生活中，梅娘的二女兒才13歲，就因無人照料病死在救濟院。家中只剩正念中學的長女柳青帶著年幼的弟弟艱難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兒子染上肝炎，治療不及，於1972年死去。從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個親人。柳青被作家史鐵生視為「自己寫作的領路人」。在史鐵生看來，正是這位大女兒，讓「梅姨」（史鐵生這樣稱呼梅娘）有了決心活下去，並且「獨自歌唱」的理由。

1978年平反後的梅娘，回到農業電影製片廠工作，相當長一段時間，出版社寄給「梅娘」的信，傳達室都稱「查無此人」，因為，整個單位沒人知道「梅娘」就是孫嘉瑞，更沒人知道她是當年名震文壇的女作家。後來經過一些文學史研究學者的上下求索，終於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發現」了尚在人世間的梅娘。於是這位曾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著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女作家，終於重新浮出水面。

「現在的年輕人，還有多少能理解我們那一代人的處境呢？」梅娘說，「青空悠悠，時序嫋嫋，強力壓頂時我敢於按著良知行事，可以說已經煉就了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的坦蕩。我只執著於人類的共同願望，那就是理解、和諧、前進。」

1978年，隨著「文革」時代的結束，對淪陷區作家的重新評價，梅娘贏得了正面的關注。

梅娘的作品「是以熱情和哀憐的情緒作為文學的骨骼，多方面的捕捉人生的動靜」。因此她筆下的人物，帶有一般女性作家對戰亂中的女性自身的關注，更顯示梅娘自己對淪陷區生活，特別是婦女命運的獨異觀察和思考。例如《魚》中的女青年芬，就好像人生羅網中一條奄奄待斃的小魚。寄讀女子中學裡好像尼姑庵似的沈寂等等，她剛開始萌生一點憧憬和追求，便遭到封建家庭的軟禁，這使她枯澀的心更加乾枯。對她來說，人生遍佈陷阱，由於涉世未深，她朦朧地愛上一個叫林省民的男人，卻不料他是個放蕩、暴虐的有婦之夫。她第二次又不顧一

切地愛上了另一個有妻室的男人「琳」，對方卻怯懦地從她身邊走開了。父母對子女的專權、男人對女人的獨占、社會對婦女的輕蔑，這三條「線」交織編成一張死死地纏住女主人公的「魚網」。小說以一個暴風雨之夜，女主人公哀怨的內心獨白，把人物的心聲抒寫得跌宕起伏、淒切動人。女主人公終於發出決絕的抗爭：「我，我看破了，網裡的魚只有自己找窟窿鑽出去，等著已經網上來的人再把它放在水裡，那是比夢還飄渺的事。幸而能鑽出去，管它是落在水裡，落在地上都好……」這種決絕的抗爭，來自對黑暗社會的絕望心情，也來自某種人生信念。

當時南北淪陷區最流行的女作家，首推張愛玲、蘇青和梅娘。她們的創作中有個共通之處，是強烈的女性意識，但由於自身修養和地域文化環境各方面的差異，又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蘇青的作品基本上囿於一己的生活和經歷，即使「海派」的風情格調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也未能使其打破題材和視野的狹窄，以及寫真人真事和單純暴露的侷限（例如《結婚十年》、《續結婚十年》）。而張愛玲的故事總是與十里洋場和老舊殖民地都市的光怪陸離，融合在一起，在深層上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浸染，也就能夠不動聲色地展示封建主義的血腥和慘無人道，具有理想幻滅的反浪漫主義傾向。張愛玲認定男女間的真情，出現在「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的時候（〈傾城之戀〉）；而梅娘則把「合理的」未來世界，寄託將出世的孩子身上（《蚌》）。這充分顯示出兩者的差異。梅娘的作品與中國「五四」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關係更為密切。她並不是以「奇」或「洋」制勝，而是注重人與人的現實社會關係，在奮力鞭撻假醜惡的時候，並沒有泯滅於對真善美理想的企盼。與此相一致，在寫作手法上，梅娘的小說側重心理分析、氣氛渲染以及環境烘托，並不過份追求情節的曲折、複雜，卻仍給人以故事感。不能不說是她的作品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說的另一個特點，是以散文的抒情筆致入小說，但又不失故事性，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裡行間顯露出女性纖細敏銳的感受，即使是採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也在娓娓道來之中，給人以疏離杳渺的感覺。

陳放在〈一個女作家的一生〉文中曾說：「1942年，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了『讀者喜愛的女作家調查』，調查結果，南方的張愛玲及北方的梅娘，是讀者最喜歡的兩位年輕的女作家。從此，文壇上出現了『南玲北梅』之說。」一般論及梅娘的文章，也都因襲此說，在《梅娘近作及書簡》書中的〈北梅說給南玲的話〉文中也有同樣的說法。若僅從兩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南北淪陷區文學的影響而言，此說基本上沒有太離譜；但若說1942年評選「南玲北梅」，時間是不確的。因為張愛玲是1943年才開始發表小說，而梅娘在這之前雖已出版兩個單行本，但她的主要作品也要到1943年後才出版。學者張泉認為「抗戰時期北京的報紙我未及逐頁翻閱，無法斷言是否進行過『讀者喜愛的女作家調查』。當時的人或現在的人虛構出『南玲北梅』說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另外學者止庵指出梅娘在〈我與張愛玲〉文中說，1942年似乎在北京見過張愛玲，梅娘所說「似乎是張的女士」則有人徑直寫作「張愛玲」。當年人物因回憶容或記錯，但後來的學者是應該明辨的。